

笔者认为,“成功的货币国际化”应该是指一国通过货币国际化能将国际金融风险控制可在承受的范围内,并在些基础上促进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本国带来战略利益。因此目标的设计是人民币国际化顶层设计的核心,它将直接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方式和路径。

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误区

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人民币国际化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首先需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混淆之处,即把货币国际化的目标与货币国际化的指标区别开来。货币国际化的具体指标有很多,比如主要货币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在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中的占比、在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中的比重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主要货币的国际使用程度。但是这些都只是衡量货币国际化使用程度的技术手段,并不是政府推进货币国际化所要追求的目标。只有认识这一点,才不至于陷入为国际化而国际化的实践误区。

假定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政府主导并推动的,那么其成功与否并非看其国际化程度的高低,而是看能否通过货币国际化达成所设定的战略目标。说到底,对中国政府而言,货币国际化只是追求战略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目标本身。笔者认为,“成功的货币国际化”应该是指一国通过货币国际化能将国际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在些基础上促进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本国带来战略利益。因此目标的设计是人民币国际化顶层设计的核心,它将直接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方式和路径。

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有最低与最高之分。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或底线是帮助中国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原罪”。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经济活动时的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是本国在国际贸易和对外筹资时必须用美元等国际货币而不是用本币计价,因此,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本国经济经常遭受国际汇率大幅度波动的伤害。比如1997年7月初泰国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因美元升值和资本外流而崩溃,泰铢汇率从之前25单位兑一美元贬值到52泰铢兑一美元。泰国商业银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从国际市场借入美元短期资金,兑换成泰铢后以较长期限贷给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项目,泰铢危机后众多商业银行因期限与货币的双重错配而陷入破产。以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不同,本世纪前10年美元出现持续贬值,中国借人民币钉住美元从而一同贬值的竞争优势赢得了出口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难以幸免的是大规模积累的美金储备



资产遭遇了重大的购买力损失。据国内第一财经研究院的报告(2011),美元针对16种大宗商品的购买力2000年至2011年8月贬值了75.6%。东南亚国家危机后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作“自我保险”,却也受到了美元贬值的购买力损失。弱小国家的货币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这些国家的利益需要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来维护。相比较,中国已是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完全有可能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摆脱国际汇率波动和美元不稳定的伤害。

笔者认为,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就是通过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使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绝大部分汇率波动的风险,赢得参与国际竞争的货币优势。

在大宗商品计价方面美国和日本分别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通过黄金为其内在价值提供支持,其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但是有限的黄金储备,以及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关系使美元供给和美元交易网络的拓展受到了限制。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实现了向纯粹信用支撑的美元本位制的转换。美元本位制取得巨大

成功,美元储备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则从1969年的54.4%上升到1977年有史以来最高点79.2%。

美国的成功经验在于美元对石油这种战略资源的“标而不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系列秘密协议,协定要求沙特继续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此后,美元与石油“挂钩”成为既定事实,任何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都必须持有把美元储备。

笔者在分析日元国际化不成功原因时,探索了1976年《牙麦加协定》废除了黄金的货币职能后国际货币价值尺度的新内涵。笔者认为,国际货币必须执行的第一职能是“价值尺度”,这在金本位制下比较容易解决,英镑与美元的价值尺度隶属于黄金的价值属性。在黄金非货币化后,美国通过推行石油的美元计价制度,奠定了美元用于石油交易的使用价值,进而扩大了美元的交易网络,巩固和强化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国的这一策略可以称为“标而不盯”。石油不像黄金那样作为美元价值的基准,而是美元成为石油的计价标准。美元不受石油价值束缚,而是影响或左右石油价格。因此当美联储需要印制更多美元投入国际市场时,美元贬值导致石油涨价,从而形成了美元“供给自主创新需求”的机制。美元投放的

越多,石油进口国必须积累更多美元储备以应付进口石油之需。因此石油的美元计价制度是美元霸权地位的第一大支柱。

相比较,在国际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日元国际化是通过不断升值获得价值效应而消耗国力的过程。从其结果看,日元沦为投机型国际货币,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与日元挂钩。1973年开启浮动汇率时代以来,就价格或汇率的稳定性而言,顺序依次为黄金、石油、英镑、美元和日元。日元汇率波动最具“戏剧性”,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日元国际化是靠升值和银行对贸易伙伴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来推进的。前者让投机者获利,并使本国制造业空心化;后者则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我们的实证分析也证明:美元波动相对独立,体现“标而不盯”;日元波动极不规则,大起大落,毫无价值尺度功能,沦为国际投机的融资货币。

事实上,日本曾有机会推进大宗商品的日元计价。Huw Mchay曾指出,“在使用日元为主要大宗商品计价的问题上,日本显得胆子太小,特别在基准价格是通过谈判方式产生而不是交易所进行买卖时产生的场合”。1985年在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中有82%被运往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如果日本各个利益集团都把日元国际化作为追求目标,那么日本钢厂一定会被要求在铁矿石和冶金煤合同中谈判中使用日元进行定价。当然新货币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计价的运用需要建立在双向贸易基础上。因为,境外公司只有同时拥有以贸易伙伴国货币计价的收入和支出,他们才有动力用这种货币进行贸易结算。

总结美国和日本在主权货币国际化经验,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黄金非货币化后大宗商品的计价有助于提升主权货币的国际使用价值,进而促进网络效应的扩张。2.大宗商品和海外金融产品计价的推进需要一国所有相关部门齐心协力,因此需要最高决策层战略规划和部署,包括签定必要的双边货币合作协定,把握时机大胆推进。3.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中需要尽可能长期维持国际投资者的升值预期,而不是让他们的预期很快“自我实现”;因此货币当局顶着外部压力,避免人民币快速升值或大幅度贬值都是必要的。4.中国对外贸易体系需要从依赖产业链的重分工体系向互通有无的水平贸易(双向贸易)体系转换。

因为丝绸适合长途贩运,并且利润高,所以李希霍芬把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了贸易和利润开辟过这条路(丝绸之路)。这些历史现在有些人不清楚,还以为是中国人为了卖丝绸才开了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的历史被误读

葛剑雄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

《政府工作报告》有个重要规划,就是“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这个规划提出后,一方面大家热烈响应,另一方面,好像实际行动也不多;一方面,得到有些国家的热烈回应,另一方面,也有些国家提出质疑,甚至认为中国是否要搞新“马歇尔计划”,搞扩张。

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历史。很多问题,无论是经验和教训,历史上都出现过,至少可以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借鉴。另外,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丝绸之路的历史真相是什么,很多都是从教科书、影视作品或者新闻报道中形成对丝绸之路的概念的。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要,才形成了丝绸之路。所以查中国的古籍,是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的。186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到中亚考察,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他结合考察情况,又对照中国历史,提出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存在着这样一条丝绸之路。

公元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开了这条路。但这如果仅仅是一条交通路线,在张骞通西域以前,早就存在了。比如说,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朝,在河南安阳发现的妇好墓里,发现的玉器就是昆仑山的和田玉,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着从新疆到内地的交通路线了。张骞通西域,是有向导的,并不是他开通的这条路。张骞通西域不是为了贸易——当时汉武帝为了一打匈奴,他想派张骞去现在的阿富汗一带去跟大月氏联系。大月氏本来在燕山这一带的,后来是被匈奴赶过去的,跟匈奴有世仇,因此汉武帝希望能联合大月氏,联合夹击匈奴。但张骞被匈奴扣住了,一呆呆了十年,后来逃脱,来到大夏,找到了大月氏。但大月氏已熟悉了这里的生活,不想再打仗了。张骞呆了一年多,用历史书上的话说“不要要领”,就回来了。

这时,汉朝已经打败了匈奴,张骞第二



次出使西域,这次带了很多,浩浩荡荡,也带上了中国的丝绸、金银财宝,沿途散给这些小国,巩固汉朝对这些小国的影响。后来中亚、西亚的人发现丝绸是好东西,然后把丝绸带到了罗马帝国。罗马那边有钱,但没有丝绸,所以有非常强大的需求。因为丝绸适合长途贩运,并且利润高,所以李希霍芬把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了贸易和利润开辟过这条路(丝绸之路)。这些历史现在有些人不清楚,还以为是中国人为了卖丝绸才开了丝绸之路。

即使在这以后,中国也从来没有过这条丝绸之路。在这之后,每当有战乱,或者西方的需求变小时,这条路也就不通了。因此从有了这条路后,往往是通的时间短,断的时间长。因为当时的自然条件恶劣,而运输代价是很高的。到了安史之乱,唐朝从中亚节节败退,一直退到长安附近,丝绸之路基本上不存在了,变成了中亚内部的一条路。

而这时,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术,到了广州、宁波这些地方。海运一通,丝绸之路的价值就没有了,因为海上运输量大,除了

丝绸,还增加了茶叶、陶瓷等日用品。所以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都有那么多的价值。

现在的形势和当时完全不同。现在建设“一带一路”的主要动力来自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对方的配合,没有对方的需求,这个经济带能建设起来吗?新疆外面现在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如果这些国家没有需要,不跟你配合,你建得起来吗?它们就是需要,是不是只有从中国才能获得呢?它们的油气是不是只能卖给中国呢?

所以说,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繁荣的丝路经济,所以现在就一定能够复兴,这是错误的。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在阿塞拜疆建了油管,但这油管还要通过中间的拜疆,如果我们还要跟更远的国家建立经济带,还是需要跟途中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全面协调。还有就是要有双赢的思路,如何让对方有相应的需求,共同得利,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古代的丝绸之路,再现辉煌。

丝绸之路畅通的前提是中央王朝的统一和控制。汉朝没有控制中亚,匈奴人就会把路截掉;西汉鼎盛时包括今天的新疆,也包括新疆境外的巴尔喀什湖,这就能畅通

了。东汉就出现了对西域控制三通三绝,三次畅通,三次又断绝过。唐朝对西域的控制不止新疆一带,而是远到中亚,甚至西亚,所以可以牢牢地控制。

我们今天要建丝路经济带,我们要不要有战略控制能力?一旦对方发生毁约或者动乱,我们怎么办?这里不是没有教训的。当初我们在利比亚援建那么多项目,2003年,我到利比亚亲自看了中国援建的输水管道项目,等到利比亚动乱,我们匆匆忙忙撤退,留下的被战乱毁了,被抢走了,到现在也不让恢复。我们现在怎么保证丝路经济带建设项目的安全,如何不因对方或中间的问题而损失?去年吉尔吉斯斯坦一批人闹事,我们200多辆集装箱卡车被抛在路上。我们现在建缅甸输油管道,已经建成了,如何保证它的安全呢?现在斯里兰卡政权更迭,不确定的因素就来了。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但人家干涉你的内政啊。如果我们的丝路经济带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同,我们该怎么办?有没有预案?我们有没有促使它们向有益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的措施,有没有安全的底线?比如美国的外交政策非常明确,保卫海外的交通线,很直接。

我们如何确保丝路经济带的成果,维护我们正当的权利?

我这次提了个提案,建议国家从现在开始建立“一带一路”的培训系统。现在连一些领导、专家都不明白,先对相关的领导、专家、企业培训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考虑、相关的历史背景、相关的政策等,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东西,再由这部分人逐渐扩大到从业人员和公众。此外,还要多向公众包括境外的人解释,不能光搞些空洞甚至是错误的宣传。比如我看到有幅漫画,画的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运了各种各样的物资,这是不可能的,运丝绸之路的东西是赚不到钱的。这样时间长了,就会对公众误导,也容易让境外的人产生“马歇尔计划”的联想。这不是偶然的,而是跟我们自己的话有关。(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

《新资本论》自序

向松祚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

(上接01版)

三个两极分化的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它背后有三个核心的推动力量,一是人类财富理念的深刻改变,虚拟财富和虚拟资本成为支配性的财富和资本理念。二是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完全信用货币(无锚货币)和浮动汇率时代来临。三是以信息和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重塑了全球产业链和分工体系。

一切为了资本,一切依靠资本,一切来自资本;一切为了股东,一切依靠股东,一切来自股东;一切为了市值,一切依靠市值,一切来自市值,是支配当代人类经济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当代人类社会则演变为公司社会、股东社会、市值社会、虚拟资本社会和资产组合社会(portfolio society)。这样的经济体系当然不是人类所期望的理想体系,它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体系,是一个令人憎恶的体系,是一个必然导致政治、社会和生态全面危机的体系,是一个践踏人文价值,缺乏基本公平和正义的体系,是一个亟需救赎和彻底改变的经济体系。

我曾经尝试用多个名称来概括以“三个两极分化”为核心特征的当代人类经济体系,最后决定将它命名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自16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诞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大体经过三次突变和三个阶段。第一次突变是商业资本主义从传统经济体系中蜕变和崛起,逐渐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商业资本逐渐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第二次突变是产业资本主义或工业资本主义取代商业资本主义,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产业资本取代商业资本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第三次突变则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更准确地说,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融合所创造的全球性垄断资本,成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第一次突变起自15世纪后期,完成于18世纪中期;第二次突变起自18世纪中期,完成于20世纪中期;第三次突变起自20世纪中期,至今方兴未艾。本书的核心主题是,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40多年,全球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终于从量变实现突变,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决定性地转变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

本书旨在系统分析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危机和救赎,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资本论》似乎是一个别无选择的书名。书分三卷,分别阐释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起源、危机和出路,章节目录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全书的逻辑结构,此处不再赘述。是为序。

(完)

管益忻：解放资本要强化控制权，淡化所有权

胡钰

(上接01版)

《华夏时报》:企业要推进资本层面的改革,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管益忻:面临的挑战主要还是理念上,有人总是“纠结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矛盾”。其实邓小平南巡时就讲过,对于姓“资”还是姓“社”,姓“公”姓“私”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若由此再回溯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生成发育史,会更加明了其“三个有利于”思想之深刻、科学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就是说,它是我们不断强化道路自信的根本理论依据。其实早在1948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邓小平对事关工商政策一个重大事件的正确处理就已显示出这个思想原则的正确性、科学性。当时,驻地鲁山县有一个大财主,造铁锅很厉害,他的生意养活了当地1万人;当时有人想打他的“土豪”,小平同志就问,“把他打倒”那谁来养活这1万人?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时,苏联土地产权问题混乱,列宁在1918年给农业人民委员写过一个便条,给了这样一个指导意见,“(这块土地)谁耕种,支配权就归谁”。列宁讲的那个“支配权”,同我们现在讲的承包权何其相似啊!

改革开放36年以来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产权束结构内部不断淡化所有权,强化控制权。在强调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我们也要保障个人财产的不可侵犯。还要看到,中国的公有制度之来源,不仅只有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它其实还同时打着中国传统“公有产权”制度的深深烙印。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盐铁专卖不就是“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中国(古典的)特色的公有制吗?另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中讲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自由人联合体,其产权“共同所有”乃“共有制”,根本不是“公有制”;更不是“中国特色”就是。进而言之“共同所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所有权”——消亡,而只有决策权。这就是说,应当打破国有制的束缚,还权于民。改革开放36年以来的另一成功经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至今获得60多万亿GDP的业绩,这呼应了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也特别需要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做基础(目前倒是国有企业在新创方面做得不够好),这就尤其要加快产权资本化改革的步伐。

(作者系《华夏时报》记者)